

论作为“中国之敌”的康德

赵敦华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1)

康德一生没有离开柯尼斯堡,但他不是书斋里的纯粹思辨哲学家。康德和同时代的启蒙学者一样关怀时代,放眼世界。由耶稣会士引入的中国思想文化对启蒙运动有巨大影响,启蒙学者依照对中国的态度分成“中国之友”(sinophilia)和“中国之敌”(sinophobia)两大阵营。“中国之友”包括伏尔泰、魁奈、莱布尼兹和沃尔夫等,“中国之敌”包括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和赫尔德等人。康德属于哪一阵营呢?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康德是“中国之友”,因为他说过:“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1](P164)}港台新儒家对康德的强烈兴趣更加深了康德与中国传统文化心心相印的印象。比如,牟宗三借助康德的“智的直观”构造了超越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他说:“以康德之特重道德而且善讲道德,则中国这一套亦未必非其所乐闻”,“我以为真能懂中国儒学者还是康德”。^{[2](P4)}果真如此吗?感谢《康德著作全集》的出版,使中国读者能在素不熟悉的康德后期著作中看到,康德确实对中国有所闻,但不是“未必”,而是“必定”对“中国这一套”“非其所乐”,因为文本证据无情地显示出康德是“中国之敌”。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友”(philia)和“敌”(phobia)如其希腊文所示,系指“友爱”或“厌恶”的态度,而非实际行为。“中国之友”们没有实际地帮助过中国,“中国之敌”也未在现实中损害中国。当然,哲学家用著述表达他们的态度,他们对西方人思想的影响如何转化为援助

或敌对中国的现实,那是另外的话题。^[3]本文通过《康德著作全集》第7、8、9三卷中的材料,透视康德对中国的蔑视和厌恶的态度。

一、对中国民族性的批判

启蒙时代“中国之敌”的共同思路是用中国地理、环境、人种和语言的特征贬低中国人的思想,法国人孟德斯鸠、卢梭和孔多塞是这样,德国人赫尔德也是这样。康德继承了这一衣钵。他在《实用人类学》中认为英国和法国是“地球上的两个最文明的民族”。^{[4](P306)}他把法国人的“激情”与“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还有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情欲”相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后者心怀怨恨而策划复仇,或者爱情执著乃至幻想。——激情是开诚布公的,与此相反,情欲则是阴险狡诈的。”^{[5](P247)}如果说对“情欲”人种的批判不专门针对中国人,那么接下来,“英国人”和“中国人”的相互指责则把中国人当做“情欲”人种的典型:“中国人指责英国人‘如同鞑靼人一样’狂躁易怒,而英国人则指责中国人是地地道道的(但却不动声色的)骗子。”^{[6](P247)}

激情和情欲固然都是人性的缺陷,但相比而言,激情只是“不审慎的发作”,发怒“有时也有好处”;而“与此相反,没有人期待有情欲”,因为情欲是捆绑自由的锁链。^{[7](P248)}总之,激情有利有弊,而情欲则一无是处:“情欲并不纯然像激情那样,是酝酿着许多灾祸的不幸心境,而

且无一例外地是恶的心境”，任何东西，即使是“乐善好施的东西”，“一旦转化为情欲，就不仅在实用上是有害的，而且也在道德上是可鄙的”。^{[8](P261)}

在《自然地理学》中，康德专门刻画了中国人性情和民族性中的“情欲”特征：“中国人性情极为不动声色。他藏在大山背后，试图探究别人的心灵”；“他们极为艺术地作伪”，“中国人在被牵涉到欺诈时并不羞愧，除非他由此被人看出有些笨拙”；“中国人有报复心，但能够忍耐到合适的机会。没有人进行决斗”。^{[9](P378)}

西方哲学开始并没有区分“情欲”和“激情”，这两个词在希腊哲学和希腊文《圣经》中都是 pathos（“欲望”）。康德为什么认为“激情”要优越于“情欲”呢？这里有个由头。康德曾借用《圣经·创始记》中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善恶果而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自然的历史是从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作品；自由的历史是从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作品”。^{[10](P118)}为什么人的自由开始于恶呢？李秋零解释说：康德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是彼此结合的社会性，人类会依照这一本性进入社会。但是，最初的社会状态使人产生依赖感，不愿意使用或觉得没有必要使用自然赋予的理性能力。“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尽管充满了完全和睦一致、心满意足和相互友爱，然而，一切才能终将永远藏匿在胚芽状态中”；人为了发挥自己所特有的理性能力，就必须把自己个体化。个体化是与社会性对立的一种倾向，如果说人因社会性而相互结合，那么，人因个体化的倾向而彼此对抗，表现为妒忌、相互竞争的虚荣心，自私的情欲、不满足的占有欲和统治欲等等。康德说，这些恶的倾向和表现唤醒了人的理性潜能，克服了人的依赖惰性，“没有这些东西，人类一切优秀的自然禀赋将会永远沉睡，发展不出来”。^{[11](P114、116)}按照康德的一贯思想，“自私的情欲”应是“激情”，“情欲”和“激情”都是堕落的产物，情欲耽于个人的肉体享受而不能自拔，而激情却促使人与他人竞争。没有激情，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理性的发展；没有理性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因此，归根到底，激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二、对儒家伦理的批判

康德的确说过：“人们也崇敬孔夫子这个中国的苏格拉底”。^{[12](P381)}但这不是对孔子的恭维，因为康德并不把苏格拉底奉为圣贤。比如，康德把“与苏格拉底的守护神类似的灵感”当做“人的一种接近妄念的傲慢”的例证。^{[13](P196)}康德说，中国人“执著地崇拜旧习俗，在来世方面尽可能地无所谓”。^{[14](P378)}他记载的中国饮食、礼仪、科学、语言、律法、宗教、婚姻等方面习俗全是落后的、负面的，乏善可陈。应注意到正是在介绍宗教习俗时，康德说出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的判断，上下文已经流露出一不屑的意味。

需要补充的是，《康德著作全集》收录的《自然地理学》是康德 1803 年最早的讲演。林克（F. T. Rink）整理了 1766—1796 年康德的讲演，收录在格拉泽纳普（H. von Glasenappie）编辑的《康德和东方宗教》（Kant und die Religionen des Ostens, 1954）一书中，其中有对儒家伦理的尖锐批判。李赫曼在《绝对否定：康德对中国哲学的批判》一文中有一些引文，此文已有中译本。^{[15](P52-57)}希望李秋零先生在再版时能依据格拉泽纳普本加以补充，以现康德对“中国苏格拉底”的绝对否定。

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说：“孔子在他的著述中只为王孙讲授道德学说的内容……并且提供了许多先前中国王孙的例子……但是美德和道德的概念从未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中。”他又说：“他们的道德和哲学只不过是一些每个人自己也知道的、令人不快的日常规则的混合物”；“整个儒家道德是由一些与伦理相关的格言、谚语组成的，这些谚语、格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一口气把它们背诵出来”。^{[16](P58、59)}黑格尔后来用几乎同样的语言说，《论语》讲的只是一种道德常识，“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17](P119、120)}黑格尔对孔子的否定态度广为人知，而始作俑者康德却被奉为“真能懂中国儒学者”，这岂不是个讽刺吗？

三、对老子的批判

康德没有放过中国哲学的另一位创始人老子。他说，神秘主义“宁可耽于幻想，而不是像一个感官世界的理智居民理所应当的那样，把自己限制在这个感官世界的界限之内。因此，就出现老子关于至善的体系的那种怪诞。至善据说就在于无”。“中国的哲学家们在暗室里闭着眼睛，努力思考和感受他们的那种无。因此，就出现了（西藏人和其他东方民族的）泛神论，以及后世从泛神论的形而上学升华中产生的斯宾诺莎主义。”^{[18](P339)}这段话令人莫名其妙：老子与“西藏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有什么关系？斯宾诺莎主义与老子的“无”有什么关系？康德是一个思想缜密的人，这里并没有胡言乱语，自有他的理路。

康德按照肤色把人分为“白人、黄色的印第安人、黑人和红铜色的美洲人”^{[19](P96)}四个“祖源”，“中国人、阿瓦人、马来人”属于混合民族。^{[20](P104)}中国人与南方的印度人和北方的蒙古人的混合，按照康德的种族决定习俗和思想的原则，“中国的哲学家”和西藏、印度的神秘主义“综合”在一起。他还认为佛教是“蜕化为大异教的基督教”，“他们在神祇中确定三个位格”^{[21](P381)}。这样，老子的“无”就通过印度和

西藏的佛教与西方神秘主义“综合”在一起。按照康德的分类，人们对“万物的终结”的理解可分为三类：第一，“按照属神智慧的道德目的的顺序，因此我们能够（在实践方面）正确理解”；第二，“神秘的（超自然的）终结，在我们一点也不理解的作用因的顺序中”；第三，“反自然的（颠倒的）终结”。^{[22](P336)}按照他的归类，康德自己的目的论属于第一类，而从老子到佛教这一“基督教的异教”、最后“升华”为“斯宾诺莎主义”的泛神论属于第二类。这是基于错误信息得出的一个“先天综合判断”，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价值。但其影响不可忽视，黑格尔把东方哲学归于简单、贫乏的“无”的范畴，只是“表面的抽象游戏”，“造成以无开端（如中国哲学），那就连手都不用转了”。^{[23](P90)}其源可追溯到康德，只是黑格尔保留了对斯宾诺莎哲学的尊重，因为黑格尔不相信康德的目的论，他的辩证法需要斯宾诺莎式的无所不包的实体。

最后重申：康德作为“中国之敌”是启蒙时代的一个产物，他对中国习俗的批判不无合理之处。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哲学的误解和敌意并不影响现在的中国人认真地学习和看待他的哲学。只是不要迷信康德，因为他对中国人和中国哲学表现出来的态度足以证明，康德也有错误，而且错误不少。

参考文献

- [1]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上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2] 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3] 赵敦华：《西方价值判断现代模式的成因中中国文化因素之考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 [4] [5] [6] [7] [8] [13] 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9] [12] [14] [21] 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10] [18] [19] [20] [22] 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11] 转引自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15] [16] 成中英、冯俊主编：《康德与中国哲学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1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23]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责任编辑 李 理）